

201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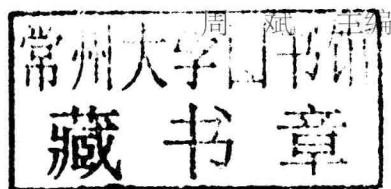
# 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 发展研究报告

周 斌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卷

# 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 发展研究报告



# 目 录

卷 首 语

1

## 第一辑：年度特稿

国产影片应真切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与心声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	周 斌	2
革命电影史观的历史命运		
——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 50 周年	陈犀禾 齐 伟	15

## 第二辑：宏观论析

论 2012 年中国新生代导演的电影叙事及其缺失	艾 青	30
2012 年国产电影表演美学述评	厉震林 罗馨儿	42
2012 年国产电影音乐不完全观察	李 果	55
在“惊恐”的瞬间消费中误入歧途 ——对 2012 年国产惊悚片的反思与重构	龚金平	64
2012 年香港电影创作述评	徐 巍	75
2012 年国产动画电影回眸	杨晓林	88
多元发展艺术精进中的 2012 年中国电视剧 ——2012 年中国电视剧生产播出状况综述	刘海波 高玉烛	105
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 ——2012 年中国纪录片观察	吴保和 李宗禹	118

校园戏剧需要实实在在的正能量  
——从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参演剧目看当今校园  
戏剧发展现状

周 涛 133

### 第三辑：热点评议

镜头与内心的距离	
——影片《搜索》的混搭风格	岳晓英 144
《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	周仲谋 150
“喜”从何来？	
——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	王庆福 162
从2012年热播的《甄嬛传》看古装剧对历史的 重新想象	金丹元 游 溪 169
电视剧《心术》略评	马以鑫 180
青春励志剧的观念嬗变	
——以《北京青年》为例	周倩雯 188
最耐读的“吃货”	
——看《舌尖上的中国》有感	黄 玲 198
当代愚公新传奇	
——评大型史诗话剧《红旗渠》	戴 平 204
解构民国神话	
——简析话剧《窝头会馆》	梁燕丽 207
简评话剧《资本·论》	罗 政 217

### 第四辑：理论批评

稳中有进 喜中带忧	
——2012年中国电影批评发展述评	李建强 高 凯 222
2012年中国电视剧研究论文综述	金丹元 马楠楠 236
2012年中国话剧研究综述	杨新宇 247

## 第五辑:关注上海

上海电视剧创作复苏之思	郦国义	266
上海电影发展的成绩、短板与出路	朱鹏杰	270
“末世”舞台与信仰重构		
——2012年上海话剧舞台述评	尹永华	279
上海戏剧原创力生态调查	胡凌虹	287
上海市大学生电影观众群调查报告	万传法 周爱军	300

## 第六辑:产业发展

影视文化产业园区盈利模式研究	贺 显	316
----------------	-----	-----

## 第七辑:学术争鸣

中国“戏曲电影”诸问题		
——读《中国戏曲电影史》	聂欣如	328
影像中的历史与民族性		
——评电影《一九四二》	冯 果 田 奥	344
温故未能知新		
——评电影《一九四二》	郭海燕	355
附录:上海影视戏剧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365

后 记	周 碩	366
-----	-----	-----

## 第一辑

### 「年度特稿」

● 国产影片应真切地表达人民大众

的诉求与心声

● 革命电影史观的历史命运

# 国产影片应真切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与心声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

周 斌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之际，重读《讲话》，颇感其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具体阐述了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sup>①</sup>。同时，还对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70 年来，时代在不断发展，《讲话》的基本精神也一直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不仅与《讲话》的基本精神相一致，是其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而且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时代内容和主要特点，从而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众所周知，电影是最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样式之一，它拥有巨量的观众群，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电影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新世纪以来，国产影片的创作数量不断增长，2011 年故事片产量已达到 558 部；同时，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市场的拓展也十分迅速，2011 年电影票房收入已达到 131.11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达到 70.31 亿元。由此说明，国产影片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当下，国产影片的艺术质量尚不能令人满意，不仅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和

<sup>①</sup>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 页。

欢迎的有影响的精品佳作较少,而且大多数影片由于各种原因还无法进入影院与观众见面;2011年进入影院放映的故事片约160部,还不到全年故事片产量的三分之一,大多数故事片未能在影院公映,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在进入影院放映的故事片中,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也不多。同时,国产影片既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的电影市场,也需要大力拓展海外的电影市场。因此,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如何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克服创作中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不良倾向,使之更真切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与心声,让他们喜闻乐见,并赢得其口碑,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 (一)

新世纪以来,电影创作生产的体制机制改革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家电影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全社会投资电影的积极性日趋高涨,除了原有的国营电影制片生产机构外,投资电影制作的民营影视企业和其他性质的社会机构大量涌现。同时,由于国内电影市场拓展迅速,票房收入节节攀高,故而香港、台湾等地的许多影视机构也纷纷进入内地发展制片业务,合拍片数量随之增多。这种情况使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呈现出较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投资渠道多样,资金来源充足,长期以来电影投资不足、资金短缺的局面得以改变,从而使电影产业基础逐步稳固,不仅创作生产活力日趋增强,而且发展空间也日益扩大。同时,则使电影产量不断增长,有效地促进了电影创作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干预和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部分投资者拍摄电影之目的并非是为了繁荣发展电影艺术,其中为了赚钱牟利者有之,为了“玩票”者有之,为了捧红某个女演员者也有之,这样就使电影的商品特性和娱乐功能得到了不恰当的放大,在消费主义文化的主导下,创作中的媚俗、庸俗、低俗之风渐盛。显然,当资本和利润制约、影响乃至绑架了电影创作时,创作者如何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并在创作拍摄中坚守艺术良心,体现艺术追求,以确保影片的艺术质量,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确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投资者投资拍摄一部影片也希望有很好的回报,亏本的买卖谁都不愿意做。而电影市场的竞争又很激烈,只有高质量、有特色的影片才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取胜,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因此,力求能拍摄出一部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和欢迎的好电影,力求使投入的资金不亏本,在这方面,投资者和创作者的目标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为此,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作者,对电影的属性和功能应该有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一方面注重让电影创作生产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并努力增强其观赏性,使之能在电影市场上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改变大多数影片亏本的局面,使电影创作生产能更好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投资者和创作者对电影的基本属性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应该看到,电影固然是一种商品,要进入电影市场让广大观众消费,并以此收回投资和盈利。但是,电影毕竟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商品,而是否具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很好的文化内涵往往会影响其在电影市场上的口碑和收益。更何况电影还担负着文化传承、文化启蒙和文化普及的责任,对此更不能忽视和遗忘。故而在电影创作生产中只注重凸显其商品特性而忽略其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说过:“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盈利是合理的。但它毕竟是特殊商品。如果为了利润而损害影片内容,或在取材上以上座率为目标,这便是‘向钱看’的结果。为了‘向钱看’,便需要迎合,而迎合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创造的大敌,都须刮骨疗毒。”<sup>①</sup>此言甚是。因此,投资者和创作者既要考虑影片的市场回报和能否盈利,但又不能一切“向钱看”,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或降低影片的艺术品质;应该充分尊重电影艺术创作规律,重视对影片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开掘,重视强化影片的艺术创新,努力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既确保其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又使之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影片产生叫好又叫座的效应,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其次,投资者和创作者对电影的功能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应该看到,电影虽然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但它同时还具有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因此,只强调某一种功能而忽视其他功能的做法,也是十

---

<sup>①</sup> 《钟惦棐文集》(下),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分偏颇的。一部成功的影片往往在满足观众娱乐和审美需要的同时,还能帮助观众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历史和人生,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和感悟。而不同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影片,其娱乐性的体现也有所不同。一些题材严肃的文艺片虽然未必像商业片那样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但它却能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得到情感的共鸣、心灵的净化或思想的提升,并由此获得审美愉悦。即便在非常重视电影娱乐性的好莱坞,其在热衷于拍摄各种类型商业片的同时,于各个历史阶段仍然相继拍摄了诸如《怒火之花》(1940)、《出租车司机》(1976)、《被告》(1988)、《永不妥协》(2000)、《决不让步》(2005)等一批注重面向现实,既针砭各种社会弊端,又表达普通民众诉求的文艺片,这些影片也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由此既建构了好莱坞多元化的电影创作生产格局,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审美娱乐需要,也体现了电影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如今,当我们许多电影创作者在纷纷借鉴乃至模仿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时,也不应该忽略向其现实主义电影学习借鉴,以更好地推动国产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生产。显然,在创作中只重视电影的娱乐功能,而忽视它的其他功能,甚至追求“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做法,则是不正确的。因为电影既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又要提高观众的审美鉴赏能力和艺术品味;而观众审美鉴赏能力和艺术品味的提高又能反过来促进电影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匈牙利电影美学家巴拉兹所说:“艺术的命运和群众的鉴赏是辩证地互为作用的,这是艺术和文化历史上的一条定则。艺术提高了群众的趣味,而提高了的群众趣味则又反过来要求并促进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规律对电影艺术来说,要比其他任何艺术更正确百倍。”<sup>①</sup>由于中外电影发展史和电影接受史均已证明了这一点,故在此不赘述。

因为上述两个方面涉及电影观念、创作目的和创作态度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若要使国产影片能更真切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与心声,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投资者和创作者首先应该在这两个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观念。

---

<sup>①</sup> 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 (二)

国产影片创作拍摄的出发点,首先是要从满足国内和华语地区广大观众多元化的审美娱乐需要出发,努力创作拍摄出各种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影片;其次才是积极拓展欧美电影市场,并争取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赢得奖项,以提高华语电影的地位,扩大华语电影的影响。正如导演张扬所说:“中国影人更要贴近当下,说中国人自己的事。”<sup>①</sup>因此,如何更好地使电影创作为国内和华语地区广大观众服务,并赢得他们的喜爱和欢迎,是创作者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那种单纯为了迎合西方国际电影节评委或西方电影观众的口味,并以此来决定影片创作拍摄的题材、样式和风格等的做法则是不值得提倡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创作者不仅对国内和华语地区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和电影市场的发展趋向要有所了解与把握,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历史、思想和追求也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上去选择题材、开掘主题、塑造人物、建构风格,才能使影片既能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又能表达出创作者对生活和历史的看法与评价,凸显出一定的新意。显然,《讲话》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并认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sup>②</sup>的观点,今天来看并没有过时,仍应为广大电影创作者所记取。在当下的电影界,为拍摄一部影片而组织主创人员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做法已不多见;不少创作者是凭着主观想象和以往的生活积累在进行创作,即使有时候到生活中去采风,也常常是“蜻蜓点水”式的,并没有潜入生活的底层进行认真观察、体验和研究。许多明星除了接连不断地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之外,还忙着参加各种商业走秀活动,根本就无暇深入生活,因而他们对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状况,以及各个阶层、各类群体(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思想动态与心理特征等就缺乏准确、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这种情

---

① 载 2012 年 5 月 4 日上海《新闻晨报》。

②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3 页、第 64 页。

况当然会影响到国产影片的创作发展和艺术质量。

近年来,国产影片创作在近现代历史题材(含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古装大片的拍摄方面有了显著拓展,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影片。前者如《太行山上》(2005)、《霍元甲》(2006)、《集结号》(2007)、《梅兰芳》(2008)、《叶问》(2008)、《建国大业》(2009)、《风声》(2009)、《南京,南京》(2009)、《十月围城》(2009)、《让子弹飞》(2010)、《新少林寺》(2011)、《建党伟业》(2011)、《辛亥革命》(2011)、《金陵十三钗》(2011)等,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同时,革命先驱者、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人物传记片的创作也很兴旺,如《毛泽东与斯诺》(2000)、《毛泽东在1925》(2001)、《周恩来万隆之行》(2002)、《邓小平》(2003)、《毛泽东去安源》(2003)、《邓小平1928》(2004)、《毛泽东回韶山》(2007)、《毛泽东和他的卫士》(2008)、《可爱的中国》(2009)、《秋之白华》(2010)等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至于古装大片的拍摄,则成为创作生产的热点,其中如《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无极》(2005)、《功夫》(2005)、《七剑》(2005)、《神话》(2005)、《夜宴》(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墨攻》(2006)、《投名状》(2008)、《赤壁》(上下集,2008—2009)、《画皮》(2008)、《三枪拍案惊奇》(2010)、《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赵氏孤儿》(2010)、《白蛇传说》(2011)、《画壁》(2011)、《龙门飞甲》(2011)等,都曾在电影市场上赢得了很高的票房。与此同时,在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方面,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的成功之作还不多;与前两者相比,尚存在着明显差距。尽管在此期间也相继创作拍摄了诸如《生死抉择》(2000)、《惊涛骇浪》(2002)、《美丽的大脚》(2002)、《天狗》(2005)、《叶落归根》(2006)、《非诚勿扰》(2008)、《惊天动地》(2009)、《唐山大地震》(2010)、《人在囧途》(2010)、《最爱》(2011)、《钢的琴》(2011)、《郭明义》(2011)、《信义兄弟》(2011)、《钱学森》(2011)等一批好作品;但是,无论在创作数量上还是总体影响上,较之前两者都有较大的差距。例如,在2011年票房收入排名前10名的国产影片中,除了《失恋33天》(第四名)和《将爱情进行到底》(第八名)是现实生活题材影片外,其他均为近现代历史题材(含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古装大片。因此,现实生活题材影片创作的薄弱所造成的银幕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以及电影创作者对社会现实关照的缺失,已成为当下国产影片创作中存在的明显问题。

当然,无论是在国产影片创作生产的总体格局中,还是为了满足不同层

次和不同类型的观众之审美娱乐需求,近现代历史题材(含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古装大片的创作生产都是需要的;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革命先驱者、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人物传记片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予以倡导和实践。但是,创作者不应该忽视或回避现实生活题材影片的创作,而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银幕上反映正在变革发展的社会现实,并通过影片真诚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与愿望。因为“置身伟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发掘、不去表现。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火热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提炼主题,更好地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人民立传。”<sup>①</sup>只有这样,才能在银幕上更生动、真切地塑造国家形象,弘扬民族精神,表达人民心声。

无疑,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在题材、样式和风格等方面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创作者既可以正面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题材,以此来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弘扬时代主旋律,如《生死抉择》(2000)、《惊涛骇浪》(2002)、《惊天动地》(2009)等即是如此;也可以通过一些英模人物的传记片,着重表现他们的革命人生和奉献精神,如《任长霞》(2005)、《邓稼先》(2009)、《杨善洲》(2010)、《郭明义》(2011)、《钱学森》(2011)等即是如此。但是,更多的影片则需要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视角,在描写各类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真情实感中,展现时代变化,揭示生活底蕴,体现人文关怀,让观众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和教益,如《美丽的大脚》(2002)、《天狗》(2005)、《叶落归根》(2006)、《非诚勿扰》(2008)、《唐山大地震》(2010)、《人在囧途》(2010)、《最爱》(2011)、《失恋 33 天》(2011)、《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钢的琴》(2011)等即是如此。

在此过程中,对于重大题材影片的创作拍摄,要注意避免直接描写政策和简单图解政策等概念化创作倾向;应注重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去概括反映重大事件,并由此表达创作者对此的认识和评价。例如,以 1998 年全国军民抗击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为题材的《惊涛骇浪》(2002),就以抗洪的史实为背景,在展示大气磅礴的抗洪场面中注

---

<sup>①</sup> 刘云山《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创作更多深受群众喜爱的影视精品》,载 2010 年 9 月 30 日《光明日报》。

重刻画了一批各具特点、生动感人的英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精神品格和内心世界,使影片的思想性和观赏性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其次,英模人物传记片的创作则要注意避免使之成为简单的“好人好事”的叙述和演绎;创作者应切实把握人物的个性和情感,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其艺术形象能真实感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钱学森》(2011)作为一部塑造一代科学巨匠的传记片,既真实地描写了一个著名科学家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又生动地表现了他和妻子蒋英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注重从多侧面展示了钱学森的理想追求、独特个性和人格魅力。至于描写各类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真情实感的影片,应注重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艺术概括的创新性,要体现出创作者对生活复杂性、曲折性、艰难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与理解,避免对生活进行简单化和肤浅化的艺术描写。就拿2011年在评论界和观众中口碑很好的《钢的琴》来说,影片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生动幽默的叙事,描写了下岗工人陈桂林的一段生活和情感经历:因为下岗造成了家庭经济困难而导致老婆移情别恋傍上了大款,当她向陈桂林提出离婚时,两人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互不相让,而谁能给正在学琴的女儿一架钢琴则成了抚养权之关键。为了女儿,陈桂林想方设法要搞到一台钢琴。他借钱借不到,偷琴反被抓,最后在一群落魄兄弟的真诚帮助下,硬是用工厂废弃的钢铁材料造出了一部饱含父爱的“钢”的琴。影片在叙述陈桂林及其落魄兄弟为了男人的尊严和深厚的父爱而克服各种困难造琴的过程中,又穿插了对爱情和友情的生动描绘,并表现了他们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由此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并给观众以多方面的启迪。

总之,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无论选择什么题材,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底层叙事,都应该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深刻地概括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揭示生活的内涵和本质。但是,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手法上,则可以是多样化的,并不一定完全局限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然,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仍然能够拍摄出成功之作。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实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巴赞所说:“我们把力求在银幕上充分展示现实的一切表现体系、一切叙事手段称为现实主义的。”<sup>①</sup>因此,凡有助于在银幕上展现生活真实的艺术形式和技巧

---

<sup>①</sup>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手法在创作中都可以运用。此外,表现现实生活的影片也可以运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和技巧手法,从而使影片在艺术上更加多样化,在百花齐放中更能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新意识和艺术个性。例如,描述一个有心理创伤的青年农民“树哥”人生命运的《Hello,树先生》(2011),在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中就糅合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其幻想和心态,从而使影片的美学风格显得别具一格、富有新意。

### (三)

无疑,任何文艺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创作者的个人诉求,并体现了其理想、情感和追求,电影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电影毕竟是最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样式之一,它应该更多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情感和心声,正如巴拉兹所说:“电影艺术乃是群众思想的产物。”<sup>①</sup>因此,那些只表达了创作者个人诉求和情感的影片往往是小众化的,很难引起广大观众的观赏兴趣。故而,创作者要尽可能把个人的诉求和情感与人民大众的诉求和情感有机结合起来,巧妙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使影片引起广大观众的观赏兴趣与情感共鸣。要如此,创作者就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真正把握时代脉搏,洞悉社会现实,了解民众诉求,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之诉求与愿望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能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视角和电影形式,以及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去概括反映现实,由此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看法。可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拍摄出来的影片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一定的思想文化内涵,又具有较明显的艺术创新性和较强的观赏性。

显然,真实反映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积极赞颂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给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及其精神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讴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应该成为国产影片创作的主旋律。近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创作拍摄了一批成功之作。例如,无论是描写西部边远山村女教师张美丽坎坷命运,并颂扬其奉献精神的《美丽的大脚》(2002),还是表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几个普通法官在流动法庭办案之旅中命运波折的《马背上的法庭》(2006);无论是描绘中国航天员的生活经历、事业奋斗和理想追求的《飞天》(2011),还

<sup>①</sup> 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是根据被誉为“当代雷锋”的郭明义之先进事迹改编拍摄的《郭明义》(2011)等,都在弘扬时代主旋律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其中《郭明义》(2011)的票房收入还突破了6000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由此既说明了广大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喜爱和肯定,也说明了主旋律电影创作只要遵循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努力塑造出真实感人的银幕形象,传达出真情实感,即使艺术上朴素无华,也能吸引和感染广大观众,并得到他们的欢迎和好评。无疑,类似这样的创作是应该大力提倡、积极推动的。

由于目前电影观众的主体是各类青年群体,其中又以都市青年为主,故而为了适应他们的审美娱乐需要,以他们(特别是白领阶层)的事业追求和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影片创作就十分兴盛,如最近两年来拍摄的《杜拉拉升职记》(2010)、《爱出色》(2010)、《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我愿意》(2011)、《亲密敌人》(2011)、《失恋33天》(2011)等,都曾受到青年观众的欢迎。这类职场拼搏加恋爱婚姻的爱情片,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下都市青年的诉求、情感和愿望,其中投资只有1000多万元而赢得了3.5亿元票房的《失恋33天》(2011),则创造了国产影片的一个奇迹。虽然对于该片来说,恰当的档期选择和巧妙的营销策略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影片创作者对失恋青年情感变化和心理特征的准确把握,以及通过叙事和台词对各种婚恋观的艺术表达,也是影片吸引广大观众的重要原因。尽管此类爱情片对青年观众有较大的吸引力,但也要防止创作中的粗制滥造和“一窝蜂”等不良倾向,要注重开掘影片的内涵和凸显新意。在这方面,《最爱》(2011)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同为爱情片,该片则以艾滋病患者的爱情婚恋为艺术表现对象,既揭露了因农村“血头”组织农民卖血而造成了艾滋病泛滥的状况,又真切地描绘了艾滋病人的生存困境和爱情情感,从而赋予影片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体现了较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创新意识。

同时,由于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以及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存在;为此,国产影片的创作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些矛盾、问题和弊病,而应该对此进行必要的暴露与针砭。正如《讲话》所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sup>①</sup>电影创作者也

---

<sup>①</sup>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理应承担起这一基本任务,大胆直面社会现实,在赞颂真善美的同时,暴露和鞭挞假恶丑,以自己的作品干预生活,显示出应有的现实批判精神,由此更好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诉求与心声。高尔基曾说:“艺术的目的是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来消灭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习气所造成的生活中的可耻的卑鄙龌龊。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给现实拍照,他或是肯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坏现实。”<sup>①</sup>因此,在银幕上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的艺术形象来扬善惩恶,真切地表达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和评价,充分发挥电影的社会影响力,应该是国产影片创作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在这方面的创作还较薄弱,实有进一步加强之必要。

例如,反腐败斗争既是人民大众所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是一场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老百姓对各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反腐败斗争予以很大的关注和支持。胡锦涛总书记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sup>②</sup>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也曾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要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sup>③</sup>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腐败不消除,老百姓的怨气也难以平息,社会的安定团结则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在银幕上真实生动地表现反腐败斗争,既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也是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世纪之初,以此为题材的《生死抉择》(2000)曾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广受好评,而且还获得了1.16亿元的票房收入。由此说明,此类题材的影片是颇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但是,近年来涉足这一题材领域的成功之作很

<sup>①</sup>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页。

<sup>②</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sup>③</sup> 载2011年3月15日《文汇报》。